只供阅读 请勿侵权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1937 年 7 月至 1945 年 8 月）

第三章　敌内建耳目　险中取情报

一、开展统战工作建立双面政权

抗日战争时期，钦廉四属党组织利用国共合作抗战之机，积极开展对国民党驻军和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党组织还巧妙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将一批党员及进步人士安插进国民党地方政府内部，从而掌握了国民党部分地方政权，将其转变成“白皮红心”两面政权，有效地配合了党的对敌斗争。

争取上层人士　配合隐蔽斗争

1938 年初，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北海人民也积极投身其中。2 月，中共北海地方组织重新建立。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救国工作，北海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所提出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的方针和广东南路特委所提出的“应当迅速开展各阶层、各党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开展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团队的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官兵一致抗日，保卫国家民族的独立”的指示，积极开展对国民党驻军和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推动国民党当局实行抗战的政策措施，有效地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初期，北海地区国民党政权的主要人物有：广东省抗日自卫队第十三统率区主任、原国民党十一师副师长邓世增（后任广东省第八行政区专员）；国民党北海第五区区长刘瑞图；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书记潘荫玑；合浦一中校长周胜皋；国民党合浦县县长邱桂兴；国民党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这些人尽管其政治背景和想法不同，但在国共合作的大环境下都不得不表示对抗日救国的某些热情，这就为北海地区党组织开展这些人的统战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邓世增是地方实力派人物，为了扩大势力捞取政治资本，他也常以反对镇压抗日运动的姿态来抵制第八区专员吴飞、合浦县县长邱桂兴等外来势力。北海党

组织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争取邓世增在某些事件上对党组织进行支持。在邓世增周围聚集了一批地方实力派人物，其中有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书记潘荫玑、合浦一中校长周胜皋、廉州中学校长蔡振伟、地方绅士伍瑞楷等。每当邓世增与这些人一起召开会议商议重大事情时，北海党组织就派李英敏以合浦日报社代表的身份参加他们的会议。由于潘荫玑、周胜皋、蔡振伟、伍瑞楷等都比较开明，因此，每当李英敏在会上提出代表党组织的主张时，都能得到他们的支持，邓世增也随之赞同。

1938 年 8 月，国民党合浦县政府任命反共顽固派叶天一为合浦一中校长，中共合浦特支发动各界人士坚决反对，要求撤销对叶天一的任命。事前，党组

织委派李英敏、赵世尧向潘荫玑等打了招呼，说明拒绝叶天一当合浦一中校长而拥护周胜皋当合浦一中校长的目的，又由潘荫玑向邓世增作了说明，因此得到了邓世增的默许。合浦一中党支部也派代表做了刘瑞图的统战工作，取得刘瑞图的同情和支持。当县长邱桂兴扬言对请愿学生动武时，邓世增以学生们都是世家子弟，出了事不好办为由，阻止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北海党组织领导的反对叶天一斗争也取得了胜利。

虽然这时北海党组织还处于秘密状态，但国民党当局已从张进煊、赵世尧、王文岜、李英敏等的言行中，察觉了他们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基于这时国共合作的形势，仍然采纳了他们的抗日主张。而且由于北海党组织对统战工作做得好，在国民党开始防共、溶共和反共的时候，一些地方开明人士还设法保护了这些党员。1939 年底，廉中校长蔡振伟参加一个会议回来后，向廉中党支部书记钟高鉴透露：国民党当局制定了许多规定来限制共产党，许多老师挨点了名，主要是张进煊、张存芳等老师，提醒老师们要注意。从而使党组织及时得到有关信息而做好了安排。北海党组织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不仅壮大了抗日队伍，而且也保护了党的组织。

林增华是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大革命时期，他曾加入共产党，又兼有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大革命失败后，他脱离了共产党，但保留了国民党党籍，抗战前到广西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随国民党一七五师来到北海。因此，林增华较易于与

共产党员接近，刚到北海即主动到各抗日群众团体听汇报、作指示。这样，林增华就熟识了赵世尧、张进煊等，并凭直觉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但并不难为他们，反而积极支持他们的抗日活动。北海党组织也就趁机派一批党员与林增华建立了联系，促使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支持党组织所从事的抗日工作。1938 年秋，林增华为了吸收更多的青年参加抗日工作，采取增人不增薪的办法，扩大了一七五师政工队，并将他所得的主任应酬费划入政工队的费用，吸收一批中共党员加入政工队，拓展了北海党组织的活动范围。他还按照北海党组织的意图，以一七五师政治部的名义主持召开了合浦抗日青年代表会议。对社会上出现的反共迹象或事件，他都主动与北海党组织联系，表明维护团结抗日的态度。1939 年春，防城县出现国民党驱逐进步教师的事件，林增华及时将情况告知了中共党员王文崑，意欲让王文崑转告北海党组织进行防范。1939 年 5 月，合浦党组织被破坏，县委书记李士洋等被捕。林增华除了电告国民党桂林绥靖公署政治部、第四战区政治部和四十六军政治部，申诉国共合作的大义之外，又利用去广东韶关的机会，将这一情况告知了中共党员区梦觉，嘱咐区梦觉向中共广东省委报告并设法营救被捕人员。

1939 年 11 月，为了建立一支合法的青年学生的抗日队伍，中共合浦县廉北区委和北海党组织通过共产党员李梓明的兄弟李坚（刘瑞图的秘书）与刘瑞图的关系来做刘瑞图的思想工作，使刘瑞图同意由区署提供枪支弹药和经费，组建北海学生抗日武装自卫队。

1939 年，为了开展革命活动，开辟和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白石水地下党组织深入农村联系群众，对当地一些知名人士，如张存芳、张富廷、张必才、张金声、张雅斋、赖玉廷、黄福贤、钟顺芝、朱玉光等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出面支持张世聪担任白石水、金街、东馆、红岭几所小学校长，安排一批共产党员到各个小学以教书作掩护，进行秘密革命活动，并由党组织物色及与群众事先商量好，推荐安排进步人士韦六吉当白石水乡乡长，包官廷、叶梓才（均是共产党员）任保长，朱澜清（柑子根党支部书记）任旧州乡副乡长兼乡队副，打进敌人内部，了解敌人的动向，掌握部分武装。

1940 年，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期间，张雅斋主动拿出枪弹、粮食支持游击队；张金声开办的锅厂成了接济游击队的据点；黄福贤把其知道的情况暗中告诉游击队。国民党“围剿”白石水时，一七五师五二五团营长王秉元和广东省第八区保安副司令陈国勋提出要与时任中共白石水区委委员、白石水武装大队大队长张世聪直接对话，解决武装冲突，先后两次都是通过张存芳、张雅斋的联系和引导实现双方会面的。

利用矛盾　安插力量

1941 年 7 月，中共合浦中心县委书记黄其江来灵山县检查工作，在灵城附近的白水塘村何贤宗家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会上，黄其江讲述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及其教训，分析了当前形势；阐述了党的“三大法宝”（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指出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除了要有强大的政党并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强大的力量外，还要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方针。会议提出了建立“白皮红心”两面政权的新课题。鉴于前一阶段，国民党顽固派要解散爱国青年组织的抗日武装自卫队和抗日政治工作队的情况，考虑到党组织倘若掌握了国民党某些政权，挂着国民党的牌子，发展革命力量，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则有利于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因此党组织对灵山县的上层人物进行研究分析，选择统战对象，开展统战工作。

当时灵山县存在宁可风和劳权两个封建派系，两派之间为夺取灵山的权力而明争暗斗，互相倾轧。

宁派，以司马塘村的宁可风为首。宁可风曾先后任过灵山县和合浦县的县长，在蔡廷锴的十九路军任过职，积极主张抗日；在抗战初期曾任灵山县抗敌后援会、抗日游击队等领导职务，支持爱国青年组织抗日自卫队以及抗日宣传的活动，在灵山的地主绅士中较有名望。这一派的主要人物有：黄质胜、劳履吉（劳乃祥）、劳肖白、邓典初（政美）、邓政香、纪家寿、廖壮南、仇光华李玉岗、杨志英、梁春岩等。

劳派的头子劳权当时任灵山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兼灵山中学校长，猖狂反

共，推行蒋介石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学校中着力发展三青团员。他凭着反革命的政治嗅觉，对当时参加蔡延锴二十六集团军政治工作队的一群青年的进步倾向有所察觉。

这两派人都反对共产党。劳派是灵山反共的急先锋；宁派中有些人如黄质胜、劳履吉、劳肖白、邓政香、纪家寿、仇光华、杨志英等也是露骨的反共分子，宁可风也反共。劳派和宁派在反共方面的基本差别：劳派反共第一，抗日第二，反共高于一切；宁派则抗日第一，反共第二，反共不很猖獗。他们对待青年态度是：劳派认为只有思想反动的人才可用，排斥任何稍有进步思想的人；宁派则重视青年人的才干，对有些进步思想的人亦加以任用。宁派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笼络青年，使青年为其所用，成为他们的势力，替他们争夺权利，绝不是纵容和帮助共产党。

分析了灵山这两派的情况后，党组织研究决定，将宁可风为首的一派（含邓典初、劳履吉等绅士）作为统战对象，派莫平凡、邓业懋、邓业兢等人接近他们，做他们的工作，从而利用宁派去打倒劳派，削弱灵山的反动势力。利用宁派肯用一些青年人的特点，通过关系争取安排中共党员到国民党县政府中工作，到各乡去当乡长和到各校去当校长。党组织利用与宁派的关系来发展自身的力量，但又绝不能让宁派头子了解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以防止可能发生的反共事变。

1941 年 4 月，当国民党广东省第八区专员邓世增来灵山时，劳权将他暗中开列的所谓“赤色分子”（包括在灵山活动的合浦、钦州、防城的进步青年在内）黑名单交给邓世增，要求逮捕这批进步青年。邓世增曾拿这黑名单向邓典初、宁可风（均为县参议员）征求意见。邓、宁看了名单后，极力加以否定，说这批青年一个都不能抓。县长苏萍生也同意邓、宁意见，不同意抓这批青年。最终劳权的阴谋没有得逞。此事件得益于党组织早已派人接近宁派人物，做了他们的工作，使得他们认可党组织的抗日行动；而他们出于派别斗争的需要，为了扩充实力，也想借助党组织的帮助。

当时，在灵山的中青年中，还有一种倾向进步的中间势力，他们大多为宁派子弟或宁派头头所赏识，如曾天庸、劳荫祖、黄裕梅、周平昆、邓业巧等。这些

人有点进步思想，起码是不反共，但是又和进步分子不同，他们有自己的目的，不愿意完全跟党组织走，不愿意为共产党的事业奋斗。例如曾天庸很有才华，一向接近党员梁中光、莫平凡等人；但很怕事，很软弱，既靠近共产党，又怕共产党，一心想跟着宁可风这些人进入仕途。又如劳荫祖是劳履吉的儿子，对土木工程很有研究，他同情共产党，靠近共产党，有时也愿意帮助党组织做点事，但是不愿为党的事业牺牲。党组织对这批人的方针和对宁派头面人物不同，尽量争取他们、团结他们，通过他们的关系更好地开展工作。

劳权派是当时灵山的当权派，宁可风派则是半在野派，但所控制的乡镇比劳派的多。劳权不甘示弱，要设法掌握更多的乡镇，由此，两派斗争日渐激烈。党组织考虑，如果听任劳派势力的发展，他们的反革命气焰会更加嚣张，对党的事业则会后患无穷。因此，必须利用宁派势力把劳权打倒。

在党组织开会研究这个问题时，黄其江指出：利用矛盾，打击反共的首要分子是必须的，但是要按照党中央关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开展斗争，要慎重行事，地下党员要注意隐蔽。会后，党组织从灵山中学入手，发动学生反对校长劳权。结果抓住了劳权贪污教育经费的罪证，在社会上公开揭露，制造要撤掉劳权校长职务的舆论。灵山中学学生在地下党员组织发动下，为了驱逐劳权，进行集会、游行，向县政府当局请愿，以及罢课等活动。劳权极力为自己辩护，说学生被“异党”所利用。而宁派却乘机出来支持学生，管理教育基金会的邓政香（宁派成员）抓住贪污事实指责劳权的不是，主张撤掉劳的校长职务。县长苏萍生只好撤去劳的校长职务。10 月，劳权灰溜溜地离开灵山跑到韶关去了，终于驱逐了革命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拦路虎。从此，灵山党组织就有计划地将中共党员或进步人士安排到国民党各级政府中去任职，建立“自皮红心”的两面政权。11 月，通过宁派关系，向县长苏萍生推荐梁中光任灵山县附城镇副镇长。1942 年初，又推荐宁其超任新圩区冠中乡乡长；劳祖康任龙和乡副乡长，何林（党员）任白花乡乡长。1942 年下半年，又推荐邓业兢（党员）任仙山乡乡长；叶铿明任烟悦乡乡长。

中共灵山特别支部还指派莫平凡加强对宁派的统战工作。莫平凡在 1943 年

夏天以前任司练小学校长，跟宁派的一些头面人物和进步倾向的中青年人有较密切的关系。他一个月左右去灵山一趟，拜访宁可风、劳履吉、劳肖白、邓典初及曾天庸、劳荫祖等人，以适当的方式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对当前问题的看法，争取机会推荐党员或进步分子到国民党政权系统或教育系统工作。此外还安排黄文法、邓业兢等党员做宁派周围一些人的工作。通过开展统战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首先，通过与宁派的关系陆续安插一些党员及进步分子进入国民党县府工作。在曾传仁任县长期间，宁可风介绍曾天庸到国民党县府中去当助理秘书；随后又介绍莫平凡到民政科去当科员。1943 年 7 月，陈公佩任灵山县长，也是依靠宁派，让宁可风等人推荐县府职员和区乡人员。党组织利用这个关系派一些党员到国民党县府中工作，莫平凡后任教育科财粮督察员；黄式高任建设科农村生产合作社指导员；蒙环任统计室主任。这些党员进到国民党县府后，秘密配合党组织开展工作：一是从中收集了解各种情况，特别是了解国民党反共的内幕；二是帮助安排小学教师，掩护党员在学校的活动；三是利用国民党要搞农村合作的做法，从名义上和经济上支持一些地区开展农民工作。入县府工作的党员，都以灰色面目出现，不参加社会上的进步活动，实行单线联系。

其次，掌握了部分乡政权。1943 年，党组织推荐梁式杲任钟灵乡乡长；何文初任陆屋区申安乡乡长，进步人士何贤宗任文书，协助何文初工作；谢以信任冠左乡乡长。为加强灵山中学的革命工作，将附城镇副镇长梁中光调到灵山中学任教，由黄文法（党员）接任附城镇副镇长。当时未找到适当人选任佛子乡乡长，但推荐了一批思想进步的中、青年任该乡的保、甲长。此前，由党员或进步人士当乡长的还有：邓业兢（党员）任仙岭乡乡长，何林（党员）任白花乡乡长，劳祖康任龙和乡副乡长。他们掌握乡政权以后，起了几方面的作用：一是通过乡政权的合法地位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抵制或限制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在当地实施；二是在该乡安排党员开展工作，掩护当地的秘密活动；三是尽量在当地组织及争取武装力量。钟灵、申安两个乡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突出，两乡的乡队基本上被党组织所掌握。

再次，安排一批党员或进步分子任各乡小学校长。原来任小学校长的党员有：邓业兢任仙岭乡中心小学校长，莫平凡任司练小学校长，何林任白花小学校长。后来随着党员和进步力量的发展，对学校控制进一步扩大，蒙环任大塘小学校长，李萃任白木小学校长，何宗贤任沙塘小学校长，周乃成任谭礼小学校长，谭兆琼任佛子小学校长，梁式杲任钟灵小学校长，黄从恩任灵家小学校长。这大大便利了党组织安排党员任小学教师，开展学生和农民工作。

同时，黄式高、蒙环、陈椿昌等党员进县政府以后，团结了几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一是办公室秘书科的机要人员；二是人事科科长；三是教育科督学；四是电台台长等。因此，党组织对县府上下来往的文件、电讯，以及来往的人员情况都比较清楚。1944 年 9 月，发生了合浦永信烟庄事件，案件牵涉到灵山县城郊萍塘村烟厂以及有关人员。第八区专署及警备司令部来了密电给灵山县政府，要逮捕灵山方面的有关党员。工作在县政府的地下党员正好在灵山县的机要科及电台台长那里看到密电，及时报告了党组织，通知有关人员迅速避开，结果灵山县府一个党员也抓不着。

党组织建立“白皮红心”两面政权后，便利了派党员到这些地区工作。如派陈秉琨到申安乡沙塘小学以教师为社会职业开展工作，在那里建立了交通联络站；派张家保到钟灵乡小学以教师职业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派蒙英翰到白花乡大远小学任教并进行革命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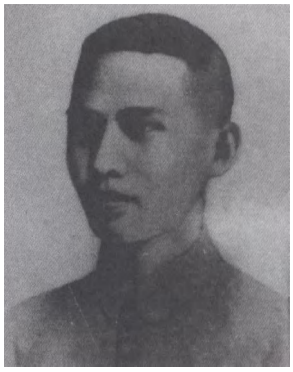
在建立了两面政权的地区，党组织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一是普遍开办民众夜校，在教学文化的同时，宣传抗日，对农民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二是用组织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农民，团结教育农民。党组织还注重发展武装力量，普遍建立乡、保抗日自卫队，由乡、保长兼任队长。到 1944 年秋，党组织在灵山一带组建了 7 个自卫中队共 800 人，为武装起义作了准备。1945 年初，灵山武装起义时，武装队伍达 400 多人。

这些曾建立过两面政权的地区，尽管在武装起义后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扫荡”，但由于这些地区群众长期受到党的教育和影响，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都积极支持革命斗争。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岁月里，这些地区依然是游击队的可

只供学习勿倒卖

靠根据地。例如灵东南的佛子、新圩、古文、三合水地区，灵西南的钟灵、陆屋申安地区，灵西的大塘、旺圩、白花、烟墩司练地区，灵北的平南，灵东北的丰塘地区等，都是国民党顽固派摧不毁的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党组织继续在龙渊、芳龙地区建立起乡、保两面政权，在武装斗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团结了各方面的力量，孤立了敌人，为党组织创造了斗争的有利条件，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邓业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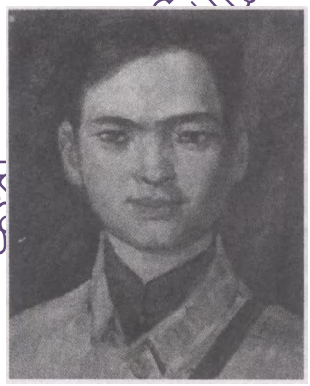
邓业兢，1922 年出生，灵山县新圩镇萍塘村人，1941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灵山特别支部宣传委员、附城区特派员、中共萍塘支部书记、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灵山大队中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等职，是灵山党组织早期领导人和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946 年 5 月 31 日，于灵山县城东郊云头岭被国民党灵山县当局杀害，时年 24 岁。

黄文法少年时的像

黄文法，1918 年 8 月出生于灵山县附城镇．1938 年 10 月在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1 月，受中共合浦县工委派遣回灵山从事地下党工作，将处于解体的青年抗日救亡宣传队的 50 多名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打入灵山抗日自卫统率委员会的整训大队，为共产党掌握武装打下基础。此后历任中共灵山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组织委员、特支临时负责人、游击大队政委等职。1946 年 9 月 28 日，在绿芦山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 28 岁。

邓业懋

邓业懋（曾用名侯启荣、陈浩），灵山县新圩萍塘人，1916 年 10 月出生，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宣传运动。1939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 年春从灵山调到　州小董地区从事革命活动，1945 年春领导小董革命武装起义，任　县人民抗日解放军参谋长，3 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　州，年仅 29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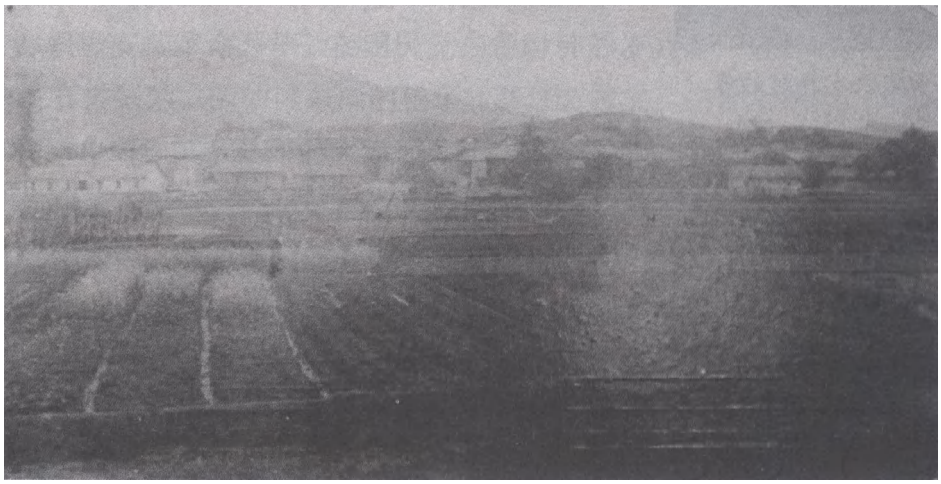


张家保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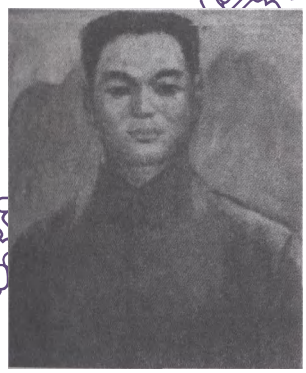
张家保，北海灰埠村人，1919 年出生，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司练支部书记、钟灵支部书记、灵南中队指导员，在西征十万山开辟新游击区时被敌杀害，时年 26 岁。

何林画像

何林，1919 年出生，灵山县平南镇口菜村人。1940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灵山抗日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灵山抗日武装起义时担任简师突击队的指挥。1945 年 2 月 8 日，在抗日武装起义中牺牲，时年 26 岁。



1942 年 9 月，中共灵山萍塘支部委员会成立。党的负责人坚持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多次登门做萍塘村开明绅士邓典初的工作。1944 年 9 月，合浦永信烟庄事件后，国民党派兵包围萍塘，追捕邓业兢等同志，邓典初挺身而出，打电话给伪县长要求撤兵，结果萍塘解围，邓业兢等同志安然脱险。图为灵山萍塘村。



黄式高画像

黄式高，灵山县平山镇灵家村人，1920 年出生，1942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灵山抗日武装起义的主要组织者，曾任广东省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灵山大队中队长、大队长等职，是灵山革命武装斗争早期的领导人、文武兼备的军事指挥员之一。1947 年 5 月 9 日，在石山脚战斗中中弹壮烈牺牲，时年 27 岁。

蒙　环

蒙环，新圩六峰村人，1916 年出生，194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 年 2 月参加武装起义；1946 年编入莫平凡大队为正式干部，随部队征战，9 月 28 日，部队从灵西转移回城南途中，于绿芦山附近的崩坎村遭敌袭击，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3 年，党组织派共产党员莫平凡、黄式高、蒙环等打进国民党县政府有关部门。图为国民党县政府部分旧址。

二、儒家巷联络点遭破坏

遇跟踪　遭拘捕

1939 年 5 月，蒋介石的亲信、特务头子蔡劲军窜到广东南路活动，配合蒋介石在全国掀起反共逆流。南路国民党顽固派在蔡劲军的授意下，不断派遣特务侦

察和破坏南路各级中共组织和抗日团体的活动。合浦国民党顽固派随即加快了反共步伐。

由于北海地区[1]的抗日运动在合浦抗日青年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更加蓬勃发展，其声势之大、人数之多、群情之激昂，令国民党合浦当局极为震惊，并认为这一定是共产党从中组织和领导。因此，国民党合浦当局采取了跟踪、监视、密报等特务手段，密切注意中共的动向。

合浦县廉州镇儒家巷蔡屋旧址

1939 年 6 月上旬，从香港来到合浦县城廉州工作的叶惠清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合浦中心县委书记李士洋认识叶惠清后，擅自决定让叶惠清到合浦中心县委机关驻地、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廉州儒家巷蔡屋的一个碉堡楼居住。当国民党特务跟踪叶惠清来到儒家巷蔡屋的碉堡楼时，确认这里是中共的秘密联络机关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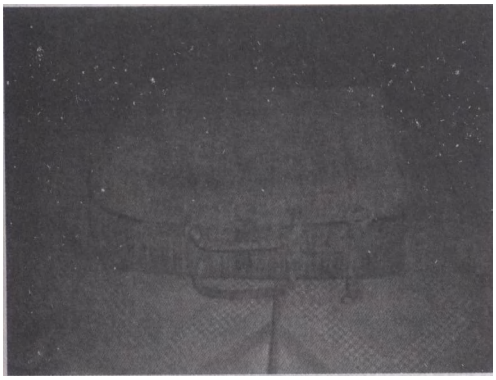
陈任生

张九匡

只供学习研究

6月16日晚11时左右，正当合浦中心县委领导成员李士洋、陈任生、张九匡、利培源及叶惠清等聚集在儒家巷蔡屋碉堡楼里阅读由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主任干事、中共地下党员庞达转来的国民党机密文件《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时，被驻在合浦的国民党一七五师的便衣队（特务连）包围，然后由两个穿着军服的军官带着几个手持驳壳枪的便衣队员以检查户口为名强行入楼内搜查。这两个军官，一个是高个子，名叫罗宝瑚，一七五师政治部情报科长；另一个是中矮个子，名叫陈泽民（后改名为陈浙民），一七五师参谋处参谋。他们进入楼里后，陈泽民便立即紧张地指手划脚布置警戒监视，并把李士洋等5人集中到三楼，派几个便衣武装凶狠地监视他们，不准他们互相说话。罗宝瑚和陈泽民便从楼下开始搜屋，搜遍二、三楼每一个角落。

罗宝瑚和陈泽民动手翻箱倒箧、仔细地搜查，其他便衣武装负责警戒。罗宝瑚搜到三楼李士洋的一个藤箱时，发现藤箱里装有几本油印的《党的建设》和一本传达当时中共广东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包括有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记录。他翻看了一会，便向陈泽民招手，叫陈泽民来到他的身旁，对陈泽民说："是中共。"并将这些文件指给陈泽民看。接着陈泽民、罗宝瑚仍继续再作彻底搜查。对全楼搜查完毕后，便将搜出的文件和其他一些抗日救亡书刊等包扎好，对李士洋等5人一起逐个询问和登记。



儒家巷事件藤箱

首先被询问的是李士洋，当问到："你是什么党派团体的？是不是汉奸？"李士洋考虑到身份已暴露，便坦率地回答："我是反对汉奸、打倒汉奸的中共党员，不是汉奸！"接着，其余4人对于他们的提问，也与李士洋一样地回答（因为当时已被罗宝瑚和陈泽民当场搜出上述党内文件）。李士洋等5人先后一致严

正地对罗宝瑚和陈泽民说："我们是中共党员，是做抗日救亡工作的，你们没有任何理由来搜查、拘捕我们。现在，只有汉奸、汪派、卖国贼才会来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救国。你们应该立即释放我们，恢复我们的自由！"陈泽民却恶狠狠地说："你们究竟是不是中共，我们现在还未弄清楚，你们现在就留在这里，不能自由行动！等我们把你们的问题查清楚后，会妥善处理。不准你们讲话交谈，不准自由行动，大小便要报告，要服从看守。"说完，罗宝瑚和陈泽民拿着搜出的文件和书刊等转身走了，留下10多个手持驳壳枪的便衣队员在楼上、楼下和楼门口外严密站岗看守。就这样，把李士洋等5人拘捕，并留在原地秘密囚禁。

次日，庞达和赵世尧通知余下的县委委员开会，商讨对策，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被捕党员的表现。待基本情况弄清以后，派张进煊到广州湾向南路特委汇报。

[1] 北海地区原指北海市（1912-1925年北海属合浦县管辖；1926-1929年建立独立市，脱离合浦县；1930年撤市复归合浦县管辖；1936-1950年曾划分为东、西两镇，先后由区和县管辖；1951年由镇升格为广东省直辖市，再次脱离合浦县）和合浦县。今指北海市和钦州市的浦北县。

坚持斗争

在李士洋等5人被囚禁了两三天后的一个下午，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广东省第八区行署专员邓世增、合浦县党部书记长周胜皋和陈泽民、罗宝瑚，还有两个穿着军服的军官（据后来了解，其中一个是一七五师军法处长廖克勤，另一个是一七五师参谋处长曾乃勤）等，一起来到碉堡楼审讯李士洋等人。

林增华首先开口说："今天我们同邓专员、周书记长来看看你们，同你们谈谈。你们的事，我们是重视的，我们一定会妥善处理。"接着，一个军官当场对李士洋等逐个审讯，当问及他们各人是什么党派团体？干什么工作的?他们5人均分别一致回答说："是中国共产党员，是干抗日救国工作的，是反对汉奸、打倒汉奸卖国贼的。"随后，周胜皋问："你们这里是中共的什么组织？"李士洋回答说："是中共党支部。"一个军官接着问："除你们这5人外，还有其他多少党员？"回答说："我们没有其他党员了。"这个军官还继续问："在我们军队中有

没有你们的党员和党组织？”回答说：“我们没有在军队中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另一个军官问：“你们有没有对军队进行什么破坏活动？”回答说：“我们是帮助军队做抗战工作的，没有对军队做什么破坏活动。我们大力发动群众支持和帮助军队抗战，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随后，邓世增责怪地说：“你们抗日救国，我是赞成的，但你们千万不要把我们合浦地方搞成海陆丰那样呀！”一个军官接着问：“最近，南康发生的米案事件，是不是你们干的？这同你们有什么关系？”对此，李士洋等坚决予以否认，并表明与他们无关。

接着，李士洋等5人义正词严地对这些官员们进行说理斗争。他们申述：“我们是中共党员，是积极进行抗日救国工作的。如今，中华民族已陷于生死存亡关头，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全国奋起救亡图存。现在，只有汉奸、汪派、卖国贼才会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救国，残害抗日青年。我们爱国、抗日，你们为什么要派兵来搜捕、囚禁我们？你们这样做，是帮助了汉奸、日寇，是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大错事。”“你们中有些人说，现在还未能查清楚我们是什么人，还不清楚是不是汉奸。这些完全是骗人的假话，这也是极大的造谣诬陷。我们希望你们还是以共同团结抗日救国为重，立即释放我们！”在李士洋等人作了这番理直气壮的说理之后，这些军官没有什么辩解。随后，林增华看了一下邓世增，并扫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说：“现在时间不早了，别的以后再讲。你们的问题，我们现已向上级请示了，等接到上级复示后，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的。”说完之后，这一行人便下楼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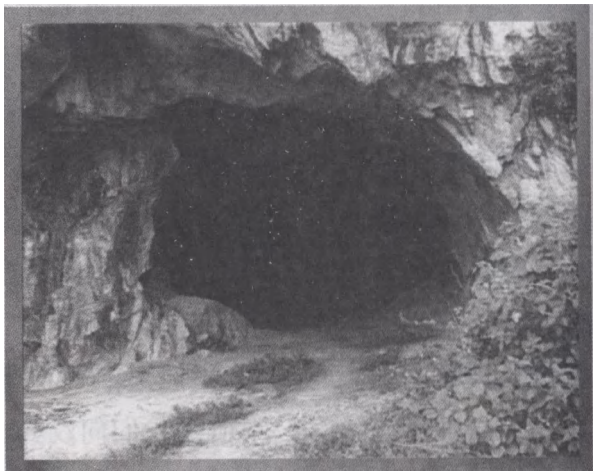
约两个星期后，又有4位身穿军服的一七五师军官一起再来与李士洋等5人谈过一次，一位军官说：“现在你们想要释放出去，你们是否可以立刻在报纸上发表个声明或登个启事，承认错误，办个手续，即可释放你们。”对此，李士洋等立刻理直气壮地一致明确表示：“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早已郑重宣告于全国了，我们作为中国共产党员，现在没有发表什么声明或登什么启事的必要。我们是坚持国共合作的，是积极抗日救国的。我们爱国无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错误，要我们承认什么错误？要我们向谁承认错误？难道要我们向汉奸、汪派、日寇承认错误吗？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们是

中国人，我们绝不能做这样的事，决不能办这样的手续。现在你们拘捕囚禁我们，是你们违反了人民抗日救国的意愿，是你们做了破坏团结抗战的错事，你们还要我们办什么手续才能释放我们，这岂不是颠倒了是非？当前国难如此深重，决不能容许破坏抗日救国，你们现在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我们！”在李士洋等作了这样的一番严正的批驳和说理斗争以后，这些军官没再作辩解，之后，走下楼去了。

异地囚禁

李士洋等5人在这个碉堡楼被一七五师便衣武装就地秘密囚禁1个多月后，一天夜幕降临时分，一个穿着军服的军官神色紧张地指挥着10多个持驳壳手枪的便衣队员，凶狠地用大麻绳分别把李士洋等5人两手反缚，联结勒住脖子，并给两股加缚，使之只能小步行动。然后由便衣武装一对一地用绳牵着他们，同时还安排有便衣武装一对一地用枪口对准他们的背脊，趁着夜色将他们转解到廉州镇平田村一七五师一〇四六团团部驻地，囚禁在一间平房里。

1个多月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把李士洋等5人一起押解到灵山县武利圩一七五师师部驻地，囚禁在一间泥砖平房里。又过了1个多月，把他们5人一起押解到灵山县石塘圩附近的一个石山岩洞——钟秀岩监牢（这是当时灵山县法院的一个临时大监狱，其中约有一、二百名囚徒）囚禁。



李士洋等被囚禁在灵山县石塘圩附近的石山岩洞——钟秀岩监牢。

在钟秀岩监狱，李士洋等5人曾发动和坚持过一次全狱绝食斗争并取得胜利。此后不久，在一次“纪念周”，一位法院院长来狱中进行宣讲“孝经”的全狱集会上，狱中党支部决定由陈任生当场公开揭露反动派对狱中囚徒的政治欺骗和麻

醉，并代表狱中囚徒们提出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全监狱囚徒，让大家立即奔赴抗日前线，参加抗日救国，保卫家乡！顿时，囚徒们欢声雷动，全狱震动，反动官员们却目瞠口呆。这次斗争大大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只供阅读请勿复印

越　狱

1940 年 4 月，日寇自钦州向灵山出击，前锋直达石塘。机枪大炮声密集，监狱的负责人和守狱武装人员仓皇逃遁。李士洋等 5 人便和钟秀岩监狱的其他囚徒一起乘机破门而出。

从钟秀岩越狱逃出后，李士洋等 5 人便一起潜到福旺（现属浦北县）附近乡村——党员谢王岗的家乡镇脚村隐蔽，继而转到党员卢壁光家乡枫木村住下。通过那里的群众关系，先联系上谢王岗，再联系上合浦县委和南路特委组织。

在这次从合浦县城被捕至灵山县钟秀岩越狱的全部过程中，李士洋等 5 人一直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没有说过有损于党组织的口供，没有泄露过党的秘密。

1940 年，经广东南路特委和广东省对“儒家巷事件”的反复审查，认为发生合浦中心县委机关、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被破坏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县委机关主要负责人对国民党反共实质认识不足，对国民党的反共逆流没有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以至于思想上麻痹大意，丧失警惕，没有切实清理和处理好党的文件，工作上违背了党的秘密工作原则，最终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导致党的工作的损失。

三、情报统战双管下清乡围剿三败北
——记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

1940 年，合浦党组织发动人民开展反对运米等战略物资资助日军的斗争，遭受合浦县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镇压。当敌人把屠刀伸向白石水区时，合浦党组织及时发动群众，组织武装，领导白石水区的抗日爱国人民武装抗击敌人的镇压、“围剿”，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乐章。

白石水武装斗争的地区仅 100 多平方公里，人口约一万左右，党组织领导的

常备武装为一个大队200余人（其中脱产的一个中队60余人；其余为不脱产的两个中队，必要时集中），民兵1000余人，装备很差；但却与兵力数倍于已的合浦国民党顽固派抗衡达一年半之久，粉碎其三次军事“围剿”。1941年春夏间，合浦中心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将白石水武装斗争转为政治斗争后，遭到强敌的第四次“围剿”，但却能提前转移了党的骨干及武装队伍，避开了敌人，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其中奥秘之一，是得益于情报交通工作和统战工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1939年，日军相继占领了合浦县属下的涠洲岛和钦州、防城、灵山等地，控制了北海海面和钦州湾。合浦各地的官僚、奸商与敌人相勾结，高价抢购大米、桐油、钨砂、银元、铜元等战略物资，偷运出去资助日军，大发国难财。如驻西场的合浦县自卫团第三支队长陈南，高价抢购大米，用船运出去资敌，在敌人封锁的海面上安全往返。驻南康的自卫大队陈均仁，驻沙岗的自卫团第七大队队长王国光，白石水乡乡长梁文光，小江镇镇长宋赞乾等都干这些勾当。王国光还与汉奸勾结发动地方绅士签名欢迎日军，遭到当地爱国力量的反对。在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合浦当局被迫撤掉王国光大队长的职务。针对汉奸、贪官的卖国行径，合浦中心县委根据党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从1940年3月起，先后在廉州、小江、寨圩、西场、白石水等圩镇发起反汪、反逆流、反运米资敌斗争，要求严惩奸商。但是，当局不但不采纳，反而多方庇护。国民党广东省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邓世增，把南康群众查获的奸商和一船大米放了；小江群众拦截资敌的大米，县政府却派兵为奸商护送大米外运。斗争愈演愈烈，合浦国民党顽固派恼羞成怒，镇压请愿群众，逮捕小江请愿的两个农民和西场10个集会示威群众（其中党员7人）。

白石水区委按照县委指示，配合全县反汪、反逆流、反资敌的斗争，在白石水圩上，掀起一场重点针对该乡乡长梁文光运米资敌和贪污勒索罪行的反对运粮资敌的斗争。

在斗争中，党组织比较注重统战工作，发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白石水区委派柑子根党支部书记朱澜清打进国民党旧州乡任副乡长，并担任该乡自卫大

只供学习勿作商业

队的副官，掌握了部分乡政权及自卫大队的部分领导权。朱澜清打进国民党内部后，党支部工作交由王克负责，并与王克进行单线联系。旧州乡自卫大队是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武装，原由地主绅士吴国本、吴国保任正副大队长。在朱澜清任该自卫大队副官后，逐渐取得两吴的信任，逐步改编该队伍，把400多人编为4个中队，有意识地在中小队长及其他积极分子中秘密发展共产党员。经过努力，逐步掌握了该武装队伍，将其演变成农村各阶层的抗日统一战线武装力量，后为共产党所用。

在白石水乡改选乡长时，党组织派张世聪（白石水区委统战委员）参加竞选，大获全胜，把运米资敌、罪恶累累的原乡长梁文光挤下。但合浦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拒不承认选举结果，梁文光拒不交权。党组织另推荐宝雅塘村同情、支持共产党的开明人士韦六吉为候选乡长，韦当选后对共产党的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党组织还对当地一些进步开明绅士开展统战工作，在武装自卫斗争过程中，得到这些人的同情和支持，为共产党的斗争提供了许多帮助。

白石水柑子根党支部旧址

党组织同时还加强情报交通工作，在白石水地区建立了众多的情报交通点，如在大成街开了一间沙糕店作为情报交通站，在文利、黄恙坪、上坝村、瓦窑窝等地建立了几处秘密联络点。其中上坝村钟大伯（钟念朝）家是白石水区委的一个主要联络站，成为区委成员来往驻脚之处，该站的重要通信任务

常由钟大伯的儿子钟二哥（原名钟应廷）来承担。各情报交通员舍生忘死从事情报交通工作，确保了党组织情报信息的灵通。

在白石水武装斗争开始前，合浦中心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发动各乡镇的情报交通员，于1940年4月的一个晚上，在全县的圩镇和乡村散发张贴八路

军的通电《告全国人民书》。该传单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磨擦、破坏团结抗日、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打击了他们投降、反共、倒退的嚣张气焰，以扩大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

白石水区委接到任务后，积极组织情报交通员秘密散发该传单。情报交通员钟二哥接受到张黄镇街上散发传单的任务后，化妆成卖熟烟的货郎，背着烟丝筐，提着一支篾竹水烟筒，混在赶圩的人群里，在张黄镇穿街过巷地叫卖烟丝，在散圩以前仔细观察好要散发传单的地方。入夜三更时分，他再潜入张黄街上，在每间较大的商店和住户的门缝里塞入一份《通电》传单：在国民党张黄镇公所门前墙壁上和张黄中心小学的公告箱上均贴上《通电》。最后闯入张黄东镇的警察所，趁门口卫兵站在哨岗上倚着枪打瞌睡的时机，潜进警兵宿舍，听到警兵们鼾声大起，熟睡如泥，他在警兵的每一蚊帐顶上各放了一份《通电》；并进入警官办公室，又在每张办公桌上各放了一份《通电》。他手中还剩有一张《通电》，走出门口看见那站岗的警兵还在打瞌睡，便把手里最后的那张传单轻轻贴在警兵背后，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连夜赶回去。

结果一夜之间，从北海、廉州、西场、公馆到龙门、小江、寨圩、旧州、张黄、白石水等几十个乡镇，到处贴有八路军通电传单。该通电措辞尖锐，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丑恶面目入木三分，大大鼓舞了粤桂边区的人民，吓得国民党顽固派手足无措，草木皆兵。

据说，在张黄镇一夜之间发现了大量八路军油印传单，人们议论纷纷，都说不知夜里有多少共产党人路过这里发传单，更有人说这些传单是八路军派飞机送来的，全镇沸腾起来了，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但是东镇警察所却闹得不可开交，集中全部警兵进行检查，最后发现那位衣服背后被贴上传单的警兵当班时失职，对其进行了处罚。而实际上，这些印刷品是县委通过交通员发给区委的，是何国达负责的小江圩秘密交通站印刷的，在张黄镇散发传单的主要是钟二哥。直至几年、几十年后，合浦人民还津津乐道这件事。

在反运米资敌斗争期间，白石水人民揭露了该乡乡长梁文光运米资敌和贪污勒索的罪行，提出禁止运米资敌的正当要求。而合浦县县长李本清却对白石水区

只供学习请勿倒卖

人民虎视眈眈，决意出兵镇压。以邓世增和李本清为首的合浦县国民党顽固派武装镇压西场、小江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之后，又把屠刀伸向白石水区。

1940 年 5 月中旬，在小江区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被镇压的第二天，合浦中心县委得到邓松（由党组织指派打进国民党八区专署，从事秘密情报工作）送来的邓世增将在两天内派兵镇压白石水区反对奸商运米资敌斗争的情报。县委书记黄其江立即赶到白石水与区委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西场、小江反对运米资敌斗争惨遭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的经验教训，研究抵抗国民党顽固派武装镇压白石水反对运米资敌斗争的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如果白石水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镇压不进行武装自卫，势必重蹈小江的覆辙，招致斗争失败、人民遭殃的恶果。于是决定：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镇压坚决进行武装自卫，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作出决定后，白石水区委立即进行武装自卫的准备，并定于 6 月 2 日用“团练”的方式，召开武装自卫的誓师大会。

6 月 2 日，白石水区委动员各地的农民、青年、师生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 1000 多人（其中武装人员数百人），汇集到栊檬坳的一个大草坪上，召开“团练”誓师大会，号召群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镇压坚决进行武装自卫。张世聪在会上回顾了白石水区半年来的斗争历程，总结了斗争胜利的经验。他指出，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日本侵略者的战火已经烧到北海沿海和邻县灵山，做亡国奴的危险即将降临头上。而国民党顽固派镇压西场和小江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后，正在准备镇压白石水区的抗日人民。他讲到激动的时候，拔枪朝天“啪！啪！啪！”地连放三枪，以表示斗争的决心。并用简单、通俗的话语，引导大家分清大是大非，确立武装自卫的决心和信心，大家听后群情激昂，同仇敌忾，表示与敌血战到底。接着，他叫人牵来一头山羊，当场杀了，把羊血冲进一罐酒中，分给大家，并带头举杯，说：“誓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永不反叛！”大家一饮而尽。最后，张世聪提议各村组织武装小组，日夜轮流放哨，以螺角声为号，发现敌人，一齐出动，与敌人决战到底。

第一次反“围剿”。6 月 8 日，邓世增派国民党合浦县长李本清率领县自卫队

只供阅读请保留版权

和乡保队1000多人，分五路进攻白石水、大成等地，对白石水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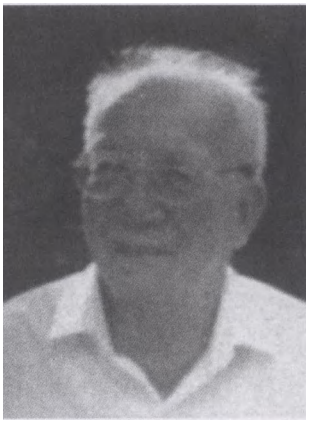
对于敌人的突然袭击，白石水区委已事前得到邓松送来国民党进攻白石水的时间、纠集的兵力、进军的路线、反动的策略等军事情报，组织白石水人民撤到山上去了，只有东馆小学的两位女教师罗德崇和蔡琳来不及撤退而被捕。

白石水金街小学（1939年秋建立合浦县工委的会场）旧址

区委及时派出情报联络员摸清了来敌的兵力和企图：进攻柑子根学校的旧州乡的乡保队；进攻金街学校的是张黄、马栏的乡保队；进攻红岭学校的北通的乡保队；县长李本清亲自率领县自卫大队，直奔白石水圩，驻扎在自水学校内。敌人企图先利用乡保队分片驻扎镇压，如遇到抵抗，便以县自卫队为主力，集中兵力来进攻。接着，由李英敏主持，在坡顶开会分析敌情，研究对策，最后决定采取军事上决还击和政治上分化瓦解相结的办法对付敌人。

白石水红岭小学旧址

首先对盘踞在大成圩小学国民党地方团队进行火线喊话对其进行策反。主要针对乡保是被骗来打“土匪”的情况，泛开展政治瓦解的宣传教育作，向乡保队说明白石水人民主张团结抗战、反对汪派汉奸贪官污吏，不是什么“土匪”“奸匪”，希望乡保队不要受李本清、梁文光的欺骗，为他们送死。同时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一致打日本、保家乡”等口号，要求乡保队赶快撤回去。当乡保队知道自己被李本清骗来并不是打“土匪”，而是与共产党战斗的真相后，就完全失去了战斗信心。这次喊话很成功，朱澜清父亲朱玉光老先生说得深入浅出，很有感情，那些被围困的乡保队很受感动，6 月 9 日早上，大多数乡保队就悄悄撤走了。



李英敏，原名何世权，1917 年出生于北海市。1939 年 8 月至 1940 年 5 月，任中共合浦县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中共白石水区委员会书记；1940 年夏调往海南岛工作，曾任海南区党委宣传部长等职。后曾任中央群众艺术馆馆长、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局长等职。

接着，为了营救被捕的两位女教师，白石水区委又组织农民武装队伍包围占据东馆小学的乡保队，断绝其粮水供应，使他们日夜没饭吃，没水喝，又不能睡觉，疲惫不堪。后武装队伍从逃兵口中得知，带队的是多蕉乡的乡长劳宪生，是张世聪和李英敏在廉中时的同学，便用他俩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他，晓以大义，劝他停止这场残杀抗日人民的卑鄙行为，提出只要释放两位女教师，就让开路给他们回多蕉去。这封信果然有效，劳马上回信，声明他们奉命而来，无意和农民武装队伍为敌，提出要武装大队先让路给他们，才释放这两位教师。武装大队坚持先放人后让路。几经交涉，他们答应了。当罗德崇、蔡琳从学校出来后，农民武装队伍就往后让路，被困的自卫团赶忙撤退了。

当天黄昏，农民武装队伍准备撤离东馆小学时，遭到李本清率领自卫大队的

只供阅读 请勿复印

袭击，双方发生激烈的战斗。农民武装队伍利用东馆小学的有利地势，居高临下打击顽军。顽军当晚不仅不敢进入学校，而且惊慌失措，彻夜不眠。李本清在行军中也跌伤了，气急败坏。

有趣的是，张黄的一个自卫团大队，也奉命来打白石水。领队的是钟顺资，原是廉中进步学生，与李英敏是校友。因他们不愿来攻打白石水区，便与白石水区委约定在一个地方，双方互相朝天打一顿枪，表示已交火，然后他们借故撤退。

最激烈的是勾刀水村的战斗。霸占东馆小学的自卫团撤退的第二天，合浦县长李本清带着宪兵连及自卫团 300 多人，重新占领东馆小学，并派兵洗劫勾刀水村。驻勾刀水村的 13 名农民武装队伍坚守三天三夜，据守碉堡英勇抗击顽军，第三天晚上机智地安全撤离勾刀水村。顽军进入勾刀水村后一无所获，李本清下令焚烧勾刀水村便率撤走了。经过 3 天的战斗，顽军死伤 30 多人，农民武装队伍只有 1 人牺牲。

1940 年领导白石水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白石水区委旧址——东馆小学

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军事“围剿”以失败告终。在粉碎国民党顽派的武装进攻后，共产党的威信空前提高，群众更加相信共产党，斗志十分涨，而国民党在政治上更加孤立，形成了一个十分有利于农民武装队伍发展政治局面。

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军事“围剿”失败后，双方都在重新组织力量，整部署，准备新的战斗，并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时争夺的重要对象是驻在灵山一带的国民党第二十六集团军。二十六集团军司令就是领导“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日军占领南宁后，蒋介石把蔡廷锴部调到粤桂边的灵山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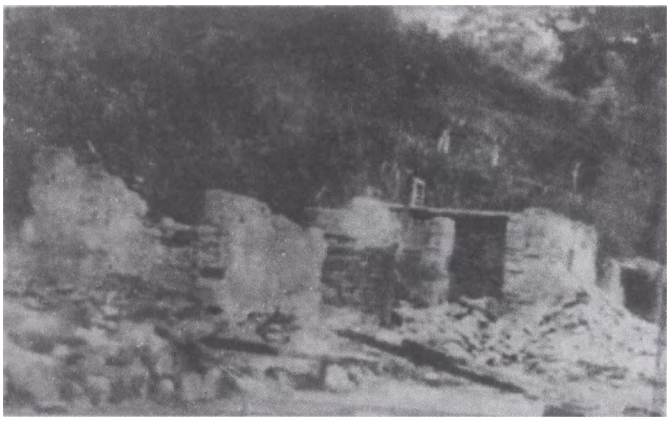
7 月，白石水武装大队党支部派朱澜清和黄春泰等为代表，到灵山三海岩二

只供学习不得公开发表

十六集团军总部递交呼吁书。当时两个军官接见他们，并听取他们的诉求。他们主要是控诉合浦县长李本清等贪官劣绅与奸商勾结，运米出口资敌，破坏团结抗战，镇压抗日人民的罪行，要求二十六集团军主持正义，支持抗日人民，打击奸商，制止官兵镇压和屠杀人民。两个军官听了以后，虽然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但交谈中表示同情，并答应向上级汇报再酌情处理。

白石水勾刀水村被国民党焚烧的民房残迹。

这时，二十六集团军总部也收到了邓世增和李本清发来的电报，说合浦白石水区“奸匪”暴乱，请速派兵镇压。电报正好落在二十六集团军军部秘书张凤楼的手上，张是在集团军工作的秘密共产党员（与灵山地下党不发生关系），他把电报先交给当时在二十六集团军政工队工作的共产党员莫平凡，并征求莫的意见。莫当即找当时中共灵山县特别支部书记罗英商量，设法挫败邓世增、李本清的阴谋，拟定推说情况不明，待派人调查、了解后再行处理。张按此意见报告蔡廷锴，蔡即表示同意，并指派中校劳耀祖率领莫平凡、何林、温之淮等前往白石水调查。



白石水勾刀水村被国民党焚烧的民房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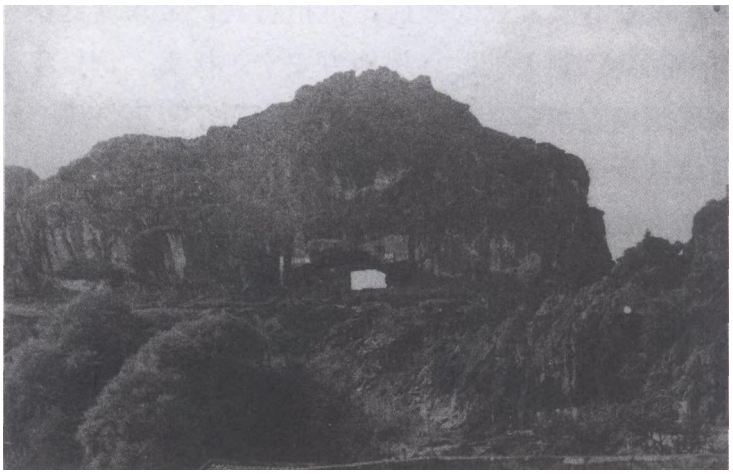
此前，白石水区委早已接到邓松送来邓世增请求蔡廷锴出兵镇压白石水人民的情报，做好了争取二十六集团军同情和支持的准备工作。

调查组到达白石水后，梁文光向调查组诬告张世聪、朱澜清等如何煽动刁民，聚众造反，反对政府，抗拒官兵，要求蔡廷锴总司令派兵“剿灭”，以保地方安宁。接着，调查组深入现场调查事实真相，看见勾刀水村全村被烧，已经变成一片废墟，找来当地乡绅、群众座谈，听取他们讲述李本清如何率兵“围剿”，烧毁民房，抢劫财物。参加座谈的乡绅、群众一致要求查清事实，制止再次屠杀人民和赔偿人民的损失。调查组还到红岭小学，会见了群众武装队伍，这些由朱澜清率领的武装队伍向调查组反映了白石水武装自卫的起因和经过，并要求调查组主持正义，合理解决事件。在武装队伍要求下，莫平凡、何林也向战士们表了态，肯定白石水人民反汪派奸商运米资敌的正义性，鼓励人民坚持斗争，争取合理解决。

蔡廷锴　1939年冬，蔡廷锴率国民党二十六集团军驻灵山，司令部设在穿镜岩内。蔡廷锴积极主张抗日，并在岩内书“振旅岩疆”四字。灵山县梁中光、莫平凡、何林等一批进步青年打入该集团军政治工作队，并在其中发展进步力量，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调查组回到灵山向蔡总司令作了汇报，说明张世聪、朱澜清只是为了反奸商运米资敌，组织人民抗日保乡，遭到合浦县当局派兵攻打。蔡总司令听了汇报后，叫人复电邓世增、李本清，说白石水的武装冲突，纯属内部纠纷，宜于和平解决。蔡廷锴这样处理白石水问题，是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敢冒风险，拒绝派兵，支持了白石水人民的正义斗争。但是，邓世增电告蒋介石和白崇禧，诬蔑白石水人民抗日自卫武装斗争是“奸匪暴乱”，并控告蔡廷锴支持和纵容共产党。蒋介石为了加强反共、排斥非嫡系，便下令彻底清剿白石水的“暴乱奸匪”，并撤销

蔡廷锴的职务，把蔡廷锴调到桂林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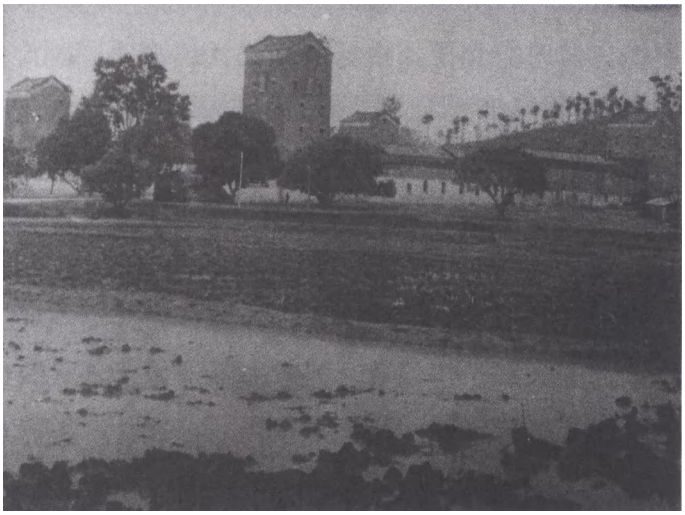
灵山穿镜岩

第二次反“围剿”。10 月初，邓世增又派李本清率兵对白石水进行第二次军事“围剿”。兵力除合浦县自卫队、白石水区各乡保队外，还有国民党一七五师的一个营（简称正规军），共 1000 多人。顽军兵分五路，重点进攻白石水区的中心地区大成、楠木根、枫木根、木头田、三角塘一带，妄图消灭白石水武装大队的主力部队，打散白石水的民兵队伍，围捕白石水的中共党员和干部。由于事前武装大队得到了邓松送来的情报，早有警惕，作了充分准备，在顽军到达白石水之前，武装大队的主力和民兵就已离开村庄撤到山上了。顽军大肆围村搜山，斩山烧林，并村围闸，十户联保，封锁粮食，采取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的计策，手段极端毒辣，企图把武装大队从中心区内赶走，使武装大队失去群众基础，以达到消灭白石水区武装力量的目的。

罗英 1940 年，共产党员罗英受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指派，到灵山建立中共灵山特别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她在灵山期间曾在大塘村以家庭教师的身份掩护工作。

只供学习请勿倒卖

李本清让一营正规军驻扎在东馆协助进行“围剿”。因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军事“围剿”的兵力比第一次大得多。白石水武装大队派出情报联络员侦察调查敌情，获悉正规军是被李本清骗来打“土匪”的，他们到达白石水后，才知道打的是抗日群众，于是，士气低落，不想打仗。因此，武装大队决定采用政治分化和游击战相结合的对策来对付顽军的军事“围剿”。首先，向该正规营展开政治攻势，争取其同情，使之保持中立，只守不攻。武装大队党支部开展思想宣传攻势，在各条交通要道上张贴标语，说明武装大队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并表明武装大队“只打反动的自卫队”，“不打抗日爱民的军队”，号召“团结抗日，争取抗战胜利”。思想宣传工作收到了很好效果，武装大队又发动群众给正规军送去一些食物，表示慰劳抗日官兵，他们很受感动。至此，这一营正规军按兵不动，没有出击武装大队。



大塘村

随后，武装大队集中力量对付李本清，并遵照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采用游击战术，日间伏击、袭击搜山顽军，夜间打枪骚扰驻地顽军。由于武装大队有群众掩护，地形熟悉，武装大队的指挥部常在佛子岭一带，与顽军距离很近，但顽军始终摸不清。武装大队选中目标就打，打了就走，如天兵下降，神出鬼没。顽军老是被动挨打，疲于奔命。武装大队派情报联络员摸清敌情，掌握了顽军的活动规律，每天都派出三、四个小分队（由几个或 10 多个人组成）进行骚扰、伏击顽军，当元醒过来要出击时，小分队早已撤退，顽军只能向深山密林扫射，浪费了大量弹药。有时还引起驻扎

在各村庄之间顽军的误会，互相开火，自相残杀。经过半个多月的战斗，顽军伤亡30多人，武装大队无一伤亡。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军事“围剿”又遭失败。

第三次反“围剿”。1941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又对白石水进行第三次军事“围剿”。这次“围剿”由国民党广东省第八区保安副司令陈国勋指挥，兵力除了已经驻扎在白石水区芳塘、东馆一带的一个营正规军之外，还有第八区保安队和合浦县自卫大队以及乡保队共1000多人。这次“围剿”的特点是：以重兵进驻，全面占领白石水区的村庄，在军事上对白石水武装大队造成强大的威胁，同时放出和谈烟幕，企图对武装大队实行政治诱降。在“围剿”前，党组织也及时得到了邓松送来国民党这次“围剿”白石水“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情报。为了揭穿其阴谋，党组织派张世聪与之谈判。陈国勋要求张世聪停止武装斗争，解散武装队伍，“缴枪”、“悔过”，并以“封官”为饵诱降。张世聪义正词严地揭露国民党当局野蛮镇压人民的罪恶，要求严惩祸首李本清、梁文光等人，赔偿人民损失，抚恤死难家属。由于武装大队有人民做后盾，顽固派不得不作让步，修改和谈条件，如缴枪改为缴一两枝破枪；写悔过书改为绅士担保等。其目的就是使武装大队认错投降，这是诱降阴谋。对此张世聪拒绝接受，谈判最终破裂。

陈国勋政治诱降阴谋失败后，准备在军事上大举“围剿”。可是，此时日军在广东沿海各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1941年3月3日，日军登陆北海，进行海盗式的掠夺，威胁着合浦县国民党统治中心廉州。为了防守廉州，陈国勋不得不暂时放弃“扫荡”计划，除留守东馆、柑子根两个据点的兵力外，带着其余队伍匆忙撤回廉州去了。因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军事“围剿”又宣告破灭了。

3月间，广东省委关于将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指示逐级传达到白石水区。9月，南路特委决定停止白石水武装斗争，埋藏好全部武器弹药，主要领导干部张世聪、陆新、朱澜清和区委书记卢文等迅速转移，已暴露的党员和群众迅速疏散。10月，合浦中心县委遵照执行，随即制定了相关措施，以争取和平解决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事件。

正当传达停止武装斗争的决定时，武装大队尚未解散，领导干部尚未撤离，国民党顽固派又于1941年10月纠集兵力对白石水区进行第四次军事“围剿”。

合浦中心县委在顽军武装进攻白石水区之前，已接到潜伏在敌内的情报员送来确切情报，县委书记黄其江奉命赶到白石水区召开武装大队骨干分子会议，极力做说服工作，布置武装大队秘密撤出各村庄，驻扎在金街、五王大岭、六罗垌以及马栏等地；主要的民兵骨干队伍和地方工作人员也撤到山上隐蔽，因而武装队伍完全避开了敌人。这样，陈国勋率领的第八区保安队十团、国民党一七五师一部和合浦县自卫大队、白石水区各乡保队，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很快就占领了白石水区大成、楠木根垌、木头田等 70 多个村庄。顽军所到之处，疯狂地围村、搜山、捉人。当时被拘捕的群众 1000 余人，其中有 40 多人被押到廉州坐牢，随后有 20 多人死于牢中（其中共产党员 3 人）。有不少群众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非常悲惨。至此，结束了坚持一年半的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

顽军在白石水区经过长达一年多的“驻剿”，全面恢复保甲制度，加强反动统治，用种种方法压迫人民群众，特别是滥捉征兵，企图彻底摧毁白石水区的革命有生力量，对白石水区的革命群众肆行劫掠，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苦不堪言。

停止武装斗争造成白石水区人民惨遭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挫伤了白石水区和全县人民革命斗争的积极性，为后来开展革命武装斗争造成很大的困难。实践证明，白石水人民在敌后区域和战争区域进行的抗日自卫武装斗争是符合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是正确的；原广东省委个别主要领导人所作的停止武装斗争的决定，既不切合历史实际，又不符合党中央当年所确定的方针政策，是错误的。

白石水武装大队使用的武器、号角等

只供阅读 请勿复印

高举抗日救国旗帜的白石水人民武装，在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次军事“围剿”期间，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这的确是重大的胜利。取得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

第一，白石水地区反对运米资敌的斗争和组织武装队伍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镇压、“围剿”，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广大人民群众从多方面支持这场斗争，他们不仅鼓励自己的丈夫、儿子或其他亲人参加武装队伍，而且从四面八方给部队提供粮食、衣物、弹药，替部队送情报，当向导，护理伤病员。总之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共产党，反对顽军，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如鱼得水，而顽军则犹如瞎子走路，处处碰壁。

第二，党组织安插在国民党政府内部工作的情报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在广东省第八区专员公署机关工作的情报员邓松，他利用专署职员的身份，搜集国民党顽固派的军政情报，把专署和合浦县府“进剿”白石水人民武装的计划和部署，如每次进攻的时间、纠集的兵力、进军的路线、反动的策略等情报，及在白石水人民进行武装自卫期间，邓世增请求蔡廷锴出兵镇压白石水人民的情报，及时送给党组织，使党组织能及时采取应变措施，挫败敌人的阴谋。还有隐蔽在二十六集团军的秘密共产党员张风楼和莫平凡，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暗中配合共产党组织设法转变蔡廷锴对共产党的态度。

第三，由于白石水区人民的抗日自卫武装斗争是正义的斗争，不仅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更通过开展统战工作及多次成功策反，获得国民党内部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参加军事“围剿”的国民党正规军一位营长，了解事情真相后，在“围剿”中按兵不动。随部驻灵山的抗日爱国将领、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接到邓世增要求其出兵镇压白石水“奸匪暴乱”后，派调查组到白石水进行实地调查，了解斗争真相后，拒绝出兵，主张和平解决，致函双方“静候政治解决”。

四、危难化险显忠诚

——记合浦永信烟庄事件

1944 年 9 月 22 日，中共钦廉四属组织在合浦县城廉州开设的情报交通联络

中心——永信烟庄，遭国民党合浦特务机关破坏。情报联络员伍朝汉、陈普坤（中共廉州特派员）、邓荣存被捕后，临危不惧，在狱中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外围的情报联络员挺身而出，冒险掩护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杨甫脱险；其他相关的情报联络点及有关人员稳妥地隐退，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党的损失。他们的行动体现了对党的赤胆忠诚。

开设烟庄

1942 年至 1943 年，全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岁月。日伪军集中优势兵力向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野蛮的“大扫荡”。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其统治区加紧针对共产党的特务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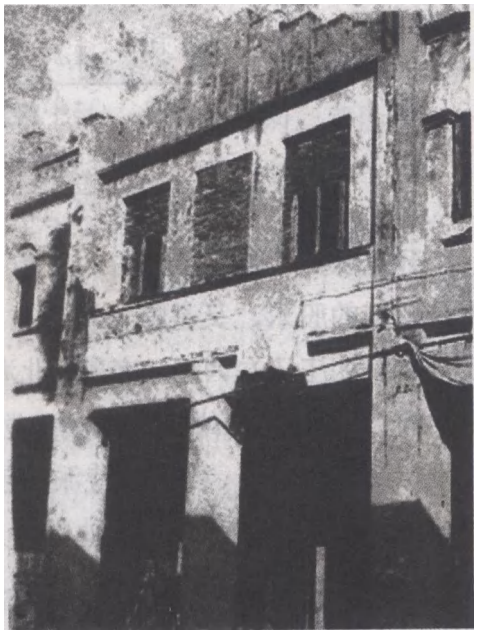
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和秘密工作的需要，1943 年 3 月，中共广东南路特委指示，撤销中共合浦县区委机构，组织领导形式改为特派员制，对下属组织改变为单线联系。由广东南路特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甫担任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直接领导合浦（含北海、浦北）、灵山、钦县、防城四县各地区的党组织。原合浦中心县委书记黄其江已于上年 8 月调回特委工作，四属党组织的领导和联络工作由杨甫负责。

杨甫自 1940 年到合浦后，大多数时间都以化名合法身份居住在合浦白沙宏德寺和梅菉垌村，进行秘密革命活动。1943 年 3 月，杨甫担负直接领导钦廉四属党组织的工作后，感到原合浦中心县委联络中心建在白沙乡宏德村的宏德小学，虽有可靠的群众基础，隐蔽性好，但地处钦廉地区东南角，偏于一隅，交通不便，对地域辽阔的钦廉四属地区联络十分不便；加上他又是外来干部，没有一个较好的社会职业作掩护，很难应付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为了便于同各地党组织负责人的联系，杨甫想在合浦县城廉州建立起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中心。杨甫听说中共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在广州湾（现湛江）、中共南路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温焯华在高州都以做生意为掩护，故想在廉州城开个店铺做生意，作为掩护其公开活动的社会职业。于是，先后同原合浦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何杏雨、中共灵山县特派员阮明、中共钦县特派员卢文等商量，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表示赞成，并认为廉州烟庄生意好做，建议办个烟庄，还能帮助解决一些活动经费。因此，杨

甫决定在廉州开设烟庄，以做生意作掩护，把廉州城作为联络中心，加强对钦廉四属党组织的领导。

1943 年下半年，杨甫即着手筹备开设烟庄的工作。首先是筹集资金。当时合浦党组织经费非常困难，除了有限的党费外，没有任何资金来源，杨甫与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商量，由党组织发动家庭较富裕以及有私蓄的党员捐献。为了党的事业，许多党员拿出自己长期积攒的钱交给组织，一些女党员慷慨地献出金链条、金镯子、金戒子等，还有的同志千方百计向家里要钱来交给组织。这样，到 1944 年上半年，筹集了近 20 万元国民党法币作资金。

第二是解决烟叶来源问题。1943 年 7 月下旬，杨甫往灵山检查工作并布置建立烟厂，解决合浦烟庄开业后烟丝来源问题。杨甫到灵山后，住灵城糖行街旧华昌号（党员邓毅家）交通站，找来阮明、邓业兢、王文法等人商量。据阮明说，灵山出产的烟叶质量很好。因而决定由灵山党组织负责在灵城筹办一个制烟加工厂，其任务是收购烟叶，制成烟丝，然后运到合浦包装出售；并通过阮明、邓毅，挑选有经营烟店生意经验的党员邓荣存为永信烟庄门市部工作人员。灵山党组织由邓毅负责筹建烟厂，经过一番筹措，即以邓业炯名义向灵山税局申请营业执照，在灵山城郊萍塘村南园正式开业，工作人员有张书坚、邓传韬、刘十五哥（刘益基）、陈普隆等党员，以及非党员群众关添、刘二、邓四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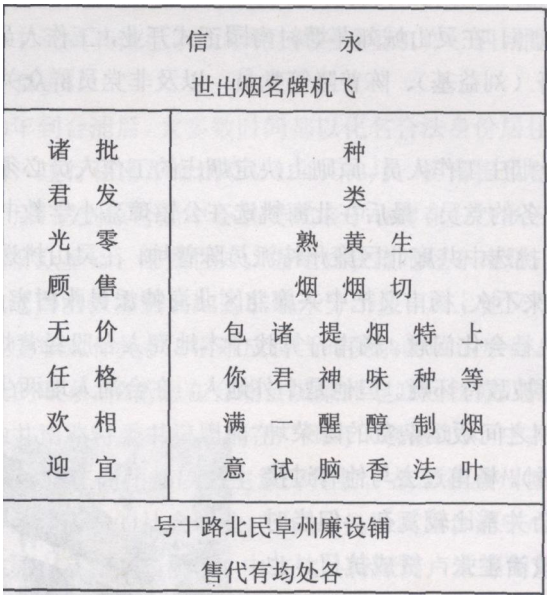
永信烟庄旧址（现合浦县廉州镇阜民北路 10 号）

只供学习与研究

第三是物色烟庄工作人员。原则上决定烟庄的工作人员必须是政治上不暴露，而又懂点业务的党员。最后在北海挑选在公馆璋嘉小学教书刚放假回家的伍朝汉，在合浦挑选中共廉北区廉州特派员陈普坤，在灵山挑选店员出身的邓荣存。烟庄办起来不久，杨甫又把中共廉北区北海特派员张树宪调到烟庄工作。

第四是解决社会化问题。杨甫打算找个本地商人合股经营烟庄生意，使烟庄社会化，以免被敌特怀疑。但他是个外地人，在合浦人地两生，只认识经常在广州湾至廉州之间贩运杂货的陈荣坤（陈普坤的哥哥）。杨甫过去与他有过接触，知道他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但当时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赞成抗日，也没有发现干过什么坏事。在找不到更合适的合股人的情况下，杨甫通过陈普坤的关系，邀请陈荣坤合股经营烟庄生意，陈荣坤用他的洋纱换钱二、三千元作入股股金。

1944 年春，烟庄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便在廉州阜民北路 10 号，租一间两层楼的铺子作为烟铺，定名为永信烟庄。接着，以刘德才（杨甫的化名）为烟庄老板兼经理的名义，向合浦税务局申请了营业执照，并于 1944 年 7 月初正式营业。杨甫挂名烟庄经理；伍朝汉当烟庄掌柜，具体负责烟庄经营业务；邓荣存负责烟丝烤制和包装。陈普坤、陈荣坤两兄弟每日都在烟庄出入，但不负责具体业务。灵山烟厂刘十五哥作交通员经常护送烟丝来，再由烟庄加工成盒装烟丝出售。烟盒的封面设计和绘图由卢文亲手制成，并在 1944 年 8 月 9 日《粤南日报》第三版刊登广告：



开业以后，伍朝汉等白天在楼下铺面工作，夜晚就住宿在店里；陈荣坤因为是烟铺的股东，又是陈普坤亲兄，也在烟店楼上住宿。

永信烟庄还在西场、南康、北海等地设了代销店，这些代销店实际都是地下党的关系网。永信烟庄的开办，党内知道的人不多，除了廉州特派员岑焕祥、南康特派员陈符隆、西场区特派员包恭、灵山县特派员阮明、钦州特派员卢文、防城特派员谢王岗等外，其他党内人员均不知道。为了保守秘密，杨甫规定：

1、永信烟庄不准存放党的文件；2、各地来联络的同志不得在烟庄接头；3、除烟庄工作人员外，不准任何党员在烟庄里住宿。杨甫白天在烟庄露面，夜晚都不在烟庄住宿。

开设永信烟庄，为杨甫的领导工作和钦廉四属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各地负责同志和交通员陆续来与杨甫联系。这时杨甫在廉州有两个秘密联络点：一个是平田一中（现合浦一中）学生党员余富茵的宿舍“平园”，另一个是廉州特派员岑焕祥家。杨甫又通过伍朝汉婶母的关系，在北海“德国楼”（天主教堂）院内租了一间房子，作为秘密工作机关和住宿的地方，其夜晚多数时间住在这里。来联系的同志先到岑焕祥家或“平园”，与岑或余接上关系，再由他们转告来接头。来与联系的有各地负责同志或交通员如陈明景、阮明等，多数在外另找地方住宿，有的住在岑焕祥家对面的房子，有的住在“平园”，也偶尔有住在烟庄的。

与国民党特务周旋

在烟庄开张营业和把合浦的工作安排好之后，杨甫于1944年7月离开合浦到灵山、钦县和防城三县检查工作和了解情况，直到8月底才返回廉州。

8月30日上午，杨甫想到“平园”去找余富茵，了解有没有人来联系过。他从烟庄出来，走到中山路廉阳茶室附近时，突然听到有人叫他“杨秋田！”杨秋田是杨甫在海南岛和广州时用过的名字，在这别乡异土的廉州突然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杨甫大感诧异。抬头看时，只见临街一间两层楼的阳台上，站着他的海南同乡陈干才。陈干才同他打招呼后，就走下楼来。

杨甫是1938年在广州认识陈干才的。1936年，杨甫在广州出狱后，找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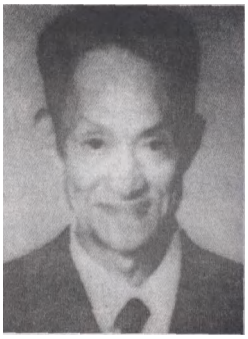
党组织，于1937年到广州湾晨光小学当教师。一段时间以后，为了急于和党取得联系，他又回到广州，因找不到地方住宿，只好找海南同乡邓楷。邓是杨初中时同学，1927年入党，后被捕入狱，在国民党监狱里和杨甫关在一起；出狱后，1936年在余汉谋第五路军当少尉参谋。这时在国民党广州市邮政局当邮电检查员的陈干才，与邓一起住在中华北路一间楼房的二层楼上，杨甫投宿到邓楷家后就这样认识了陈干才。

陈干才从楼上下来后，热情地拉杨甫到斜对面的廉阳茶室去饮茶。坐下来后，陈首先打听杨到合浦来的时间和职业，杨说，自广州沦陷后就做生意度日，东奔西走，在广州湾认识了合浦商人，就到合浦一起做生意。陈又问杨做什么生意，杨即大方地说开了个烟庄。当杨转问陈干才到合浦来干什么时，陈干才竟然公开对杨甫说："我是蓝衣社（国民党特务机构）的人。"杨听了心里一惊，但表面仍然装出非常自然的样子，以关心老乡的口吻说："你为什么干这个？做特务是不得人心的。"陈说是混饭吃。杨甫又探听了邓楷的下落，饮毕茶，陈干才付了茶钱，两人就分头走了。

陈干才的出现，使杨甫感到了严重威胁，当天晚上，杨甫回永信烟庄召开党员会议，将遇到陈干才的经过及两人谈话的内容告诉烟庄的党员伍朝汉、邓荣存等，要大家提高警惕，准备随时撤退，并研究采取一些对付的措施：一是转移各种文件和进步书籍；二是研究发生情况时走脱的方法等。第二天，张树宪（中共北海特派员）从北海来廉州，杨甫将情况告诉他，并让他在晚上把许多党的秘密文件和进步书籍拿到岑焕祥家，由岑焕祥负责处理。与此同时，杨甫又将遇到国民党特务、烟庄可能已经暴露的情况转告与他单线联系的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提高警惕，以防意外。但是，由于杨甫认为已知道陈干才的特务身份，而自己有烟庄老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陈干才还不清楚自己的政治身份，可以与之周旋，从中探听敌方情报；加上这时党的经费来之不易，杨甫舍不得丢掉烟庄的资产。因此，杨甫未能采取果断的措施撤离烟庄，而是采取一方面与陈干才周旋，另一方面想找别的商人来顶替经营烟庄的错误做法。

9月上旬，全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军为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

开始向湘桂线进攻，钦廉地区再度沦为敌后的严重形势即将到来，形势的紧迫和来自国民党特务的威胁交织在一起。因此，杨甫认为，虽然遇到国民党特务，但不能在形势十分紧急的时候丢掉党的工作而跑开，只能一边应付着陈干才，一边抓紧时间布置钦廉四属地区战时工作。在宣传方面，揭露日军侵占湘桂线的阴谋目的；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恶；说明钦廉四属地区可能再度成为敌后形势。在组织工作方面，撤退、隐蔽城镇里的党员：各中学的学生党员跟随学校迁移，积极开展师生的抗日救亡工作；安排已经暴露的或难于隐蔽的党员全部撤到农村去；以农村党组织为基础，积极收集枪支弹药，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张树宪

杨甫遇到陈干才后，白天照常到永信烟庄露面，装作若无其事，其他烟庄工作人员也仍然照常营业。而陈干才自遇到杨甫后，就缠住不放，白天经常到烟庄找杨甫聊天。陈干才的一个青年助手杨善龙，也经常到烟庄找杨甫或其他工作人员聊天。有时还在铺面的长板凳上睡觉，显然是想偷听杨甫等人的谈话及窥视动静。这样，杨甫就与国民党特务陈干才、杨善龙展开了危险的周旋。

9 月的一天，陈干才找到杨甫，说海南同乡会要开会选举理事会，要杨参加。杨甫为了敷衍他，就与他一起参加了一次海南同乡会会议。陈干才还带杨甫前去观看过特务机关发给他的收发报机，杨甫曾对陈说过烟庄生意因税收太重不赚钱的话。因此，有一次陈干才就对杨说，合浦税务局长郑重民是海南同乡，他可以帮说情减轻烟税，并带杨去找郑，但因商谈不果而散。还有一次，陈干才对杨甫说："日本人打过来了，我不准备跑，要化装隐蔽起来。"又问杨甫打算怎么办，杨甫说："照样开我的烟铺。"陈又说经济有困难，要杨甫借给他 3000 元（国币）和一套便服，说过几天就还。杨甫推脱不开，不得已借了 3000 元和一套半新的

只供学习 请勿复议

便服给他。

9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陈干才到烟铺约杨甫到廉阳茶室饮茶，又对杨甫大谈他到过重庆和韶关办过华侨商品的事，然后又说，国民党在合浦有各派系的特务组织，党政军方面有军统、中统，各银行有CC派，税务局有蓝衣社，蓝衣社又分为联络组、交际组、行动组等，并说他就是行动组的组长。杨甫听了始终不露声色，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我是生意人，对这些不感兴趣。"陈干才又说："我听别人说你是八字脚（指共产党）的呢！"并假惺惺地劝杨暂时离开廉州以避不测。杨甫说："人家爱说什么就让他们去说吧。我做我的生意，怕什么？我不离开廉州。"陈接着说："不离开也行，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会告诉你的。"陈干才花言巧语，多方试探。杨甫只谈生意，不讲政治。

杨甫从廉阳茶室出来，预感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已步步逼近，他立即赶回烟庄，召集烟庄党员开会，把这个新情况告诉烟庄的党员，要求大家小心提防。并商量决定：张树宪和陈普坤（他俩都患有肺病）先撤离烟庄，暂住合浦医院留医。杨甫还决定将中共廉州特派员岑焕祥撤离廉州，调到勾刀水当小学教师。

有一天，杨甫抽空去合浦医院探望张树宪和陈普坤，在医院里又碰上了陈干才。陈干才说，因家里生活困难，让他老婆在医院里当了护士，并介绍杨甫与他老婆认识。杨甫把这个新情况告诉了张树宪和陈普坤，并嘱咐他们小心提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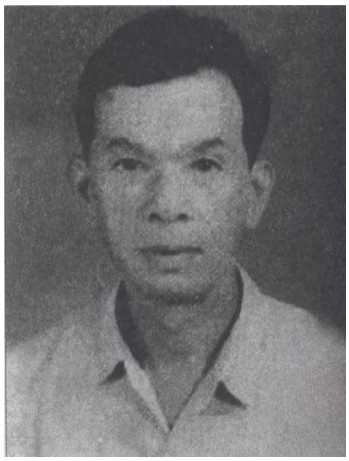
9月19日傍晚，陈干才又来到永信烟庄，他站在烟铺的屋檐下煞有介事地低声对杨甫说："最近我听见有人说你是共产党的头子，还有一部电台呢！"杨甫心里一惊，但马上装出十分生气的样子说："真是胡说八道。我是做生意的人，要电台干什么！"陈干才接着说："不是就算了，我是听别人说的。"说完就走了。

从这些迹象表明，杨甫的身份早已暴露，处境十分危险，但是，杨甫除了将这些情况告诉烟庄的党员之外，还是没有采取果断措施立即撤退，而是为了最后向廉州中学和平田一中的学生党员部署战时工作，错误地决定推迟3天才撤离烟庄。

烟庄遭破坏

9月21日黄昏，陈干才的助手杨善龙到烟庄找杨甫，杨甫不在，他就坐在柜

台对面与伍朝汉聊天，坐久了干脆在一张长凳上躺下，看样子是想等到杨甫回来。直到天黑很久关店门时，杨善龙才离去。这件事并未引起烟庄人员的注意，入夜以后，大家关店门就睡觉了。下半夜（即9月22日约凌晨三、四点钟），突然一阵阵急促的拍门声把大家惊醒。伍朝汉、邓荣存急忙起床，先叫睡在楼下的那位工人不要开门，然后两人即从烟庄后门走出，那位工人跟着出来后，翻过右邻一间中药店的后墙，进去躲起来。烟庄后门出去就是江边，伍、邓二人过不了江，就沿着河边往东北方向走，被戒严的保安队截住，就这样被捕了。原来国民党广东省第八区专员张国元调集保安团、“淮海”自卫队共1000多人，突然全城戒严，并包围了永信烟庄，企图一网打尽烟庄内的地下党员。



伍朝汉

邓荣存

敌人把伍、邓二人押回烟庄绑起来，搜查了烟庄。在搜查烟庄的过程中，虽没有党的文件，但联络信件不少，其中有王克、包恭给杨甫的几封信。幸亏县府承审员陈业昌参与现场搜查，他本是共产党员，脱党后仍然和合浦党组织有联络，经常给党组织送情报。他首先发现这些信，急忙将信藏入口袋中，并连夜派人赶往西场通知王克、包恭离开。天亮后，敌人又把伍、邓二人押到保安团部。与此同时，敌人在医院逮捕了陈普坤。住在医院另一层楼的张树宪，由于得到陈耀琪（党组织派到国民党“淮海”自卫队任少尉电务员的共产党员）的及时通知，便跟着身穿国民党军官制服、佩带手枪的陈耀琪离开医院，逃脱了敌人的搜捕。

化解危机　减少损失

敌人在永信烟庄没有抓到杨甫，即在全城封锁交通，逐户搜查。杨甫这时正

好在“平园”余富茵处。原来，这天杨甫离开烟庄，同往常一样，绕过几条僻静的小街，来到小巷深处的“平园”。“平园”是一个小小的园子，园子里座落着一座平房，园内环境幽静，这里原是廉中教师谭宏铨的住宅，余富茵和几个同学暂时租作宿舍。因此，这里就成了党的一个重要联络点，也是杨甫晚上居住地之一。那晚杨甫来到这里，和余富茵商谈布置了工作之后，已是深夜，就上床睡觉了。睡下不久，就听到一阵阵拍门声和“快开门，查户口”的吆喝声从附近街上传来。“平园”同样有人拍门，杨甫和余富茵急忙起来，两人感到情况变化突然，便急中生智，让杨甫到后院的杂草堆隐蔽起来，余富茵赶快叫屋主王大叔（谭宏铨的岳父）起来开门。王大叔把门打个半开，只见保甲长带着几个警察打着手电筒来到门口，王大叔张开大嗓门，理直气壮地说：“这里只有我女婿谭宏铨在廉中教的几个学生住，没有外人。”然后又放低声调，强作虚笑地补充一句：“信不过入来检查……”这位王大叔平时靠卖炒花生度日，是个大酒鬼，可能带路的保甲长认为这个酒鬼老头是老实人，不会说假话，于是说声“走”，就带着那几个警察转到随达书院那条小街去了。王大叔关上门后，余富茵急忙来到后院，将情况转告了杨甫，两人立即将日积月累保存下来的大批党的文件和《新华日报》、《救亡日报》、《解放》、《群众》等报刊用水浸湿搓成纸浆，倒进挖好的泥坑里掩埋起来，等到处理完这些文件、报刊，天已将亮。

由于廉州城保队和军警在夜间突然检查户口是经常发生的事，所以杨甫还没有联想到永信烟庄会遭破坏的问题。天亮时，杨甫想出去探听一下动静，便独自沿着“平园”外那条小街往中山路方向走去，刚到街口，便看到大街上还有三三两两的军警在来回巡逻，他赶快退回“平园”。余富茵把园门关一让杨甫再出去，并同杨甫约好，由他出去了解情况，不超过一小时就回来。余富茵别上布质校章，带上书本，骑着单车出去了。国民党军警对学生和公务人员都不盘问，因此畅通无阻。他来到烟庄附近，只见店门紧闭，大门上七歪八斜地贴满了盖着血红大印的封条，街上行人皆止步观看，议论纷纷。在烟庄对面的店铺门口，还有两个穿便服藏带着手枪的家伙，在鬼鬼祟祟地转来转去。余富茵急忙赶回“平园”，将烟庄被封等情况告诉杨甫，但烟庄的同志谁被捕了还不清楚。杨嘱咐余再出去探

听。余富茵来到平田一中遇到来找王献芝的张树宪，才知道敌人昨晚在医院逮捕了陈普坤，两人简单交换了情况后，张树宪便坐余富茵的单车离开了廉州。余打算回“平园”，凑巧在平田公路上遇到陈耀琪，余带着陈直奔“平园”见杨甫。三人交流了情况，才清楚地了解到昨晚发生的永信烟庄被搜查，党员伍朝汉、邓荣存、陈普坤被捕的严重事件。

陈耀琪，合浦南康人，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合浦“淮海”自卫队大队长邓世汉的外甥。1941 年 2 月，他受党组织的指派，利用与邓世增（国民党广东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邓世汉的关系，打入国民党广东八区专署任译电员。1943 年 11 月，又任第四战区合浦沿海警备区指挥部少尉译电员。他一直与中共钦廉四属党组织的领导人杨甫单线联系，为党组织搜集了大量的情报。

这时已是晌午时分，街上的敌人戒严还未解除，杨甫认为必须立即离开廉州，就与两位同志商量走脱的办法。陈耀琪想了一会，说“戒严部队上午十二时以前收缩岗哨，这么多兵都还没吃早饭，饿得呱呱叫，现在各部队各自为政，大南门只留一个哨兵，平园小街通往南康马路上戒严的都是“淮海”部队的兵，而且多是南康人，和我很熟，我可以掩护三叔（杨甫）出去。”三人经过一番谋划，决定杨甫化装成公职人员，由陈耀琪用单车搭乘通过小南门、大南门“淮海”部队的岗哨，送往南康。商量已定，三人吃过午饭，杨甫迅速向余富茵布置了几件事：一是通知廉州党支部书记王献芝立即去灵山，将永信烟庄出事的情况转告阮明，并嘱其尽快撤离烟厂，还写下了找阮明的地址；二是了解被捕同志情况，报告中共广东南路特委；三是酌情决定撤退一些学生党员（如廉中的王献芝，一中的余富茵本人等）。然后即刻化装，杨甫原穿黑胶绸便服，商人打扮，余富茵拿出自己一套浅灰线呢中山装让杨甫穿上，并戴上白通帽，扮成国民党地方官员；陈耀琪原穿军官服装，扎着皮带，戴着蓝边一粒星的布质“少尉”胸章，配着手枪，

只供阅读 请勿复印

稍一整理，神气十足。化装完毕，先由余富茵到小南门城头侦察一番，精况没有异常，便立即出发。这时大约是下午二点钟，陈耀琪骑着余富茵借来的“三枪”牌单车，后架上搭着杨甫，往城南急驰。他们通过小南门出城到公路，又通过大南门，穿过定海桥，沿途站岗的国民党自卫队士兵，看着他们的军官骑车搭着一个“官员”通过，非但没有进行盘查，还持枪肃立向他们敬礼。在后面的余富茵目送他们出了城郊，才转回城里。杨甫就这样在陈耀琪、余富茵的掩护下，安全脱险。

陈耀琪掩护扬甫撤离廉州镇

下午4时左右，杨甫和陈耀琪平安到达南康。杨甫与中共南康特派员陈符隆取得联系后，立即叫陈耀琪迅速赶回廉州，把有关情况告诉余富茵，并叮嘱陈耀琪了解杨甫租住“德国楼”的秘密机关是否被查封，如没有，就立即把杨甫的被褥衣物（没有文件）撤走。陈符隆则告诉杨甫，广东南路特委的交通员小陈来了，通知杨甫立即到特委去。于是，杨甫到白沙宏德小学附近把爱人谭德及孩子撤往灵山后，马上随小陈赶到广州湾南路特委机关，向广东南路特委书记周楠详细汇报发生合浦永信烟庄事件的经过，检讨自己政治思想麻痹、丧失警惕性的错误。周楠对杨甫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0月，广东南路特委决定：停止钦廉四属党组织活动，包括停止过组织生活、交纳党费和发展新党员，上下级之间只保持工作上的联系；对杨甫进行停职审查，指定阮明接替杨甫为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员，对钦廉四属党组织和党员进行审查。但钦廉四属各地党员在停止组织活动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斗争。

与此同时，王献芝赶往灵山找到阮明，转告永信烟庄事件的有关情况后，灵山的党员及时撤离烟厂。合浦、灵山、防城、钦县等地党组织在知悉永信烟庄事件的情报后，都作了必要的隐蔽撤退，没有惊慌失措，显得平静和稳定。

但当小江党组织负责人张书坚赶去通知情报交通员宁章毅断绝与永信烟庄的联络时，宁章毅已从浦北寨圩担了几十份《新华日报》前往永信烟庄，正在途中。后来，宁章毅来到烟庄接头，了解到伍朝汉被捕，杨甫不知去向时，正好烟庄店里有位陌生人反问宁章毅找三叔（杨甫）有何事。宁章毅意识到烟庄出事了，机警地说："没有什么，我买了他一些烟，要与他结账。"之后，赶紧借故离开了烟庄，并将报纸担回小江销毁。

9 月 25 日，阮明从灵山来到廉州，着手做永信烟庄事件的善后工作，组织党员进行隐蔽，继续坚持斗争。阮明最关注的是伍朝汉等 3 人被捕的事，并想方设法营救他们。

伍朝汉等 3 人被捕后，当天被戴上枷锁，囚禁在国民党合浦保安团部，后被转解到合浦监狱囚禁在专用于囚禁重犯的第二层牢房里，并被套上 10 多斤重的脚镣。敌人对他们进行了几次审讯，他们都临危不惧，只承认是做生意的，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没有泄露党组织的秘密，也没有说过对党不利的话。国民党广东第八区专署反动当局抓不到他们的证据，加上此时日军南侵，形势紧张，只好把他们囚禁在合浦监狱。

阮明为了探清案情，多次在晚上到东门口地下党员邓松（党组织派到国民党八区专署任南路游击指挥部译电员的共产党员）家，通过邓松、陈耀琪在专署的特殊关系，了解到专员张国元、保安副司令陈国勋审讯伍朝汉等 3 人的情况，还查阅了审讯记录卷宗。邓松、陈耀琪这两位地下党员，为营救在狱中的同志，默默地做了许多别人所不知的重要工作。

1944 年 12 月，日军从南宁向广州湾转移，途经廉州城，合浦国民党反动派弃城而逃，看守合浦监狱的国民党军警也闻风而逃之天天，伍朝汉等 3 人和同狱难友乘机越狱出来，到了附近农村隐蔽。后来，伍朝汉、陈普坤到南康找到了党组织，邓荣存回灵山也找到了党组织。阮明在合浦活动了几天，直到合浦的情况

稳定后，才到广州湾向南路特委机关汇报。

后来，广东南路特委对烟庄事件进行了严肃审查，作出结论：永信烟庄被破坏，不是钦廉四属党组织内部有人叛变出卖，而是由于党组织负责人杨甫政治思想麻痹，对国民党反动派政治警惕性不高造成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直到 1945 年 2 月钦廉地区全面举行武装起义后，才逐步恢复钦廉四属党组织的活动。

只供学习参考版权